

西域文化与出版

贺 灵

自汉代至清末民初，西域成为诸多国内外政治家、探险家、情报人员、考古工作者、文物盗贼、地质人员、人类学家、民族历史研究者及旅行爱好者的向往之地。两千多年来，这些人的足迹遍布西域各地，并为世人留下了各自形形色色的文化资料，使“西域”之概念，在世人心目中，由原始、蛮荒、遥远、神秘逐步变为古朴、壮阔、多彩和原始美。时至今日，仍然吸引着国内外各类人士涉足这片土地。自汉以降，先后有数十个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在此游猎、游牧、耕种，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使其古朴纯粹的文化与西域自然风貌组成了独具魅力的西域文化“风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西域的这一文化特色，渐渐成为新疆人民出版社各文种文化物出版的切入口和亮点，亦成为本社出版文化的优势和独特的领域。50年来，本社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锡伯六种文字，先后出版有关西域文化方面的各类读物1000多种，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内涵。

（一）

西域（包括现中亚）作为一个宜牧宜猎的蛮荒之地，秦汉以前便开始吸引北方各原始氏族部落在此各河湖流域猎牧，西域人类活动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无文字记录的传说时代。从历年来西域各处报告的文物考古成果证实，距今一万多年前，新疆南部就有人类活动；大约距今三千多年前，天山南北许多地区都有了人类活动。当时的居民既有欧洲人种特征，也有蒙古人种特征，而更多的则呈现各人种支系类型混杂或变异特征。毫无疑问，这些人类群体创造了西域的初始文明（或称文化），他们是西域传说时代的文化主体。相信随着文物考古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及尖端科技在人文科学领域的不断应用，传说时代的历史将逐步变为信史。

西域文明自汉代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由传说时代跨入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尤其是自公元前60年始，西域在政治上获得了崭新的概念，成为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汉朝对西域管辖的日臻完善，西域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日益为中原政府所认识和重视，自此，西域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开始，在中国各朝正史及其他著述、史料中，有关西域政治、军事、民族、地理、宗教、历史、文化等情况频频被载述，并且，随着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人员交流、交往的日益加强，对西域的有关记载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详尽。正是这些资料，方使世人对西域的自然环境、民族民俗、宗教、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历史等有了逐步的了解，西域神秘的面纱被慢慢揭开。

自有文字记载（汉代）以来，在西域这块土地上，曾有诸多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或游猎，或逐水草而牧，或定居耕种，并先后建立五十余个城邦之国，它们或相互干戈争战，或结盟交往，谱写了各自的历史，创造了西域丰富多彩的文化。据现存的资料所知，自汉代前后至清末，先后有氐羌、塞人、匈奴、呼揭、月氏、

乌孙、鲜卑、柔然、丁零、高车、悦般、吐谷浑、黠戛斯、铁勒、突厥、突骑施、回鹘、吐蕃、沙陀、粟特、仲云、契丹、蒙古及近代民族如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满、达斡尔等数十个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在西域游猎、游牧、耕种和生活，并且，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狩猎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和手工业文化。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不同和人文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其宗教信仰也各有不同，在西域文化宝库中留下了萨满教、祆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摩尼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文化。从语系而论，这些人类群体又分别为不同语系语族，如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汉语族，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斯拉夫语族等，语言分别有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蒙古语、锡伯（满）语、达斡尔语、塔吉克语、藏语、俄罗斯语、图瓦语等。而历史以来其使用的文字又形态各异，如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摩尼文、佉卢文、于阗文、宰利文（又称粟特文）、焉耆——龟兹文、回鹘式蒙古文、满文、维吾尔文、汉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蒙古文、锡伯文、藏文、俄文等，都曾在西域流行和使用，并留下了上述不同文字的资料和著述，大大丰富了西域史科学宝库。由于语系语族、宗教信仰的不同，以及生产形式和所处自然环境的差别，他们的社会生活习俗（包括服饰、饮食、居住、家庭、婚丧嫁娶、节庆礼仪、社会文化等）和心理素质又相互有别，各具特色。另外，在西域活动的古代和近代民族，各自以自己的喜好、习惯和文化心态，对自己生产、生活过的草原、河湖、聚居地、山川、沟谷等加以命名，留下了诸多不同语种语意的历史地名、行政区划地名、居民点地名等，形成了独特的西域地名文化。从上可以看出，几千年来，西域各族人文表现千姿百态、五彩缤纷，可谓千差万别，成为中华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领域。

两千多年来，在西域繁衍生息的数十个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不仅创造了形态各异、丰富多彩的人文财富，而且谱写了各自辉煌、悲壮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据史学界研究表明，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与古代西域诸多氏族部落、部族存在渊源关系。汉代前后，塞人、匈奴、月氏和乌孙，曾在西域逞强，其中匈奴和乌孙都曾建立地方政权，与中原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交往，后来他们经过一千多年的相互争战、交往，融合、发展和变化，成为近代哈萨克族的主要成份。丁零、高车、铁勒、突厥、突骑施、回鹘、沙陀、粟特等，则与维吾尔族均存在渊源关系，是维吾尔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鬲昆、隔昆、坚昆、结骨、纥骨、契骨、护骨、黠戛斯、辖戛斯、纥里迄斯、吉利吉斯、吉里吉思等，均为对“柯尔克孜”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译音，而蒙古人对柯尔克孜族则称为“布鲁特”，使该称呼在清代盛行一时。蒙古族在西域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比较重要，它在西域的活动历史自公元13世纪末元朝建立起便开始，他们曾在西域先后建立“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和“准噶尔汗国”，其地方政权在西域历史上都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西域部分蒙古人也被维吾尔人所同化。此外，哈萨克人和西域蒙古人之间亦有相互部分同化的历史现象。锡伯、满、达斡尔、回、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族，虽然在西域的历史时间不是很长，但对新疆的建设与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历史贡献。汉族在西域的历史自汉代便开始。之后经过两

晋、南北朝、唐、明清数代逐渐移民，汉族在西域的规模日益扩大。汉族在西域的历史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为祖国的统一、平定历次叛乱、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屯垦建设等方面，贡献尤为突出，其历史与西域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

伴随西域悠久的民族史和地区史，西域名胜、文物古迹及考古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显得尤为灿烂夺目，自古以来便为世人所注目，成为西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这些文化因素与西域历史紧密相关，是西域历史的产物，成为西域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自古以来，西域各民族就有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传统。如其民间文化中的故事、诗歌、谚语、谜语、格言、唱词，民间艺术中的音乐及其乐器、歌舞、美术、工艺、建筑、图案等，都是世人所关注的文化亮点。几乎所有西域各民族均有这些亮点。

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自古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和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多少年来，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的文化和商业交往，多以这条道路进行连接。在这里，曾经演出过许许多多中西人员往来、科技交流、商业贸易、文化输出输入等历史剧目，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

此外，西域各民族政治、哲学、法律、军事、医药、科技、教育、生产活动等，作为特定的文化现象，自古便各具特色，综合反映了西域各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总之，西域文化内涵丰富，领域广泛，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的文化现象消失了，有的起了变异，有的延续下来，有的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取向，有的则适应社会进步，被改造或填补新的内容。挖掘、整理、研究西域两千多年文化，是一个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明文化的大事，这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而论，其意义更为重要，对此，作为一个综合型出版部门，所负有的社会责任可谓义不容辞，因为，对历史上的文化，主要靠文字、图版的出版形式去整理、再现和弘扬。

（二）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党和政府便开始抓新疆文化教育建设，首先筹备成立文化出版系统。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筹备，1951年成立了全省惟一的综合型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担负起维吾尔、汉、哈萨克和蒙古四种文字的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民族、语言文字、医学、历史、文学艺术以及课本（教育）等类图书的出版任务。1954年和1956年又分别增设锡伯文和柯尔克孜文编辑室。自此，本社一直成为新疆文化读物出版的中心。50年来，本社带动和培植一批又一批各方面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文学艺术工作者等，参加新疆（西域）各民族和地区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使新疆人民出版社在西域各民族文化、地区文化和丝绸之路文化的出版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出版文化，为新疆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新疆人民出版社文化读物的出版与新疆及全国文化建设的发展基本保持一致，并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1951—1979年期间是文化建设的初步发展、惨遭摧残（文化浩劫）和恢复时期；1980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文化的兴旺发达时

期，也是本社西域文化读物出版的高峰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本社西域文化图书的出版呈现衰微的现象。在1951—1979年，也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951—1965年期间，我国的文化建设有了初步发展，但这时的出版，其文化含量并不大，出版物大量表现为农村各类初级读物及小学课本。据资料反映，该阶段，新疆人民出版社六种文字只有几十种初具文化意义的有限的几类读物。如《维汉俄辞典》（1953）、《维吾尔民间诗集》（1963·维文）、《蒙文文法》（1953·蒙文）、《心言》（诗集·1956·维文）、《维吾尔民间故事》（1956·维文）、《阿勒泰牧区调查》（1956·汉文）、《维吾尔民间谚语》（1957·维文）、《哈萨克的故事》（1958·哈文）、《巴托赛嘎图》（小说·1958·蒙文）、《锡伯族民间故事》（一）（1958·锡文）、《除夕》（诗集·1958·锡文）、《哈萨克牧区的“阿乌尔”》（1959·汉文）、《塔塔尔与祖赫拉》（叙事长诗·1959·汉文）、《蒙古族民间故事》（1959·蒙文）、《华连孙和美根芝》（1959·锡文）、《新疆歌曲选》（1962·汉文）、《汉维简明词典》（1963·维文）、《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1963·汉文）、《新疆民歌》（1963·汉文）、《柯勒木山》（诗集·1963·柯文）、《江格尔传》（1964·蒙文）、《新疆简史》（上）（1965·汉文）等。从上可以看出，新疆人民出版社该阶段具有初步文化意义的出版物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并且都缺少广度和深度，谈不上厚重的文化色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1966—1976年是十年文化浩劫时期。十年间新疆人民出版社用维吾尔、汉、哈萨克和蒙古四种文字（此时柯尔克孜文和锡伯文编辑室已下放基层）出版了2700余种图书，但都表现为极“左”思想的产物，根本谈不上文化性和知识性。1977—1978年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徘徊时期”，本社出版的近1300种维吾尔、汉、哈萨克和蒙古四种文字各类读物，70%左右亦带有当时的左倾思想，也谈不上文化积累和长效性，只有如下10余种读物谈得上浅表性的文化意义：《伊斯兰史话》（1978·维文）、《维吾尔族谚语选》、《哈萨克族谚语选》、《柯尔克孜族谚语选》、《阿凡提的故事》、《新疆历史文集》、《中西回俄历表》（以上均为1978·汉文）、《福乐智慧》、《喀什噶尔情歌》、《哈萨克族民间谜语》、《阿凡提的故事》、《新疆文史资料（一、二、三、四）》（以上均为1979·汉文）、《在阿肯的阿吾勒》（诗集）、《阿尔哈勒克》、《汉哈辞典》（以上均为1979·哈文）、《蒙古族简史》（1979·蒙文）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1979一年时间的思想整顿，自1980年始新疆人民出版社西域文化读物的出版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收获时期，这种蓬勃发展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全局而言，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以及人文科学、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目前我国人文科学和文化教育的深厚基础，是这一时期筑就的。因此，人文科学和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新疆人民出版社有关西域文化读物的出版，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这一时期，新疆人民出版社各级领导和各族编辑人员，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及时把西域文化读物的出版作为本社出版工作的重点，并且吸收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各族青年编辑，以加强编辑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和适应西域文化读物出版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本社上上下下又主动出击，广泛与科研部门、大中专院校、社会文化艺术团体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教师、艺术工作者及创作人员建立联

系，建立了水平一流的作者队伍，使本社该时期推出的六种文字（柯尔克孜文编辑室和锡伯文编辑室分别于1981和1982年恢复）的四百多种各类文化图书，代表了我区西域文化读物的最高水平，受到了国内外知识界的关注和好评。

从图书门类而言，这一时期的西域文化读物，已拓至历史、民族、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教育、地理、考古、综合等门类；读物形式有专著、资料集、文集、作品集、年鉴、百科全书、辞书、志书、索引、画册、通俗读物、表册等，其中译著（由汉文译成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由少数民族文字译成汉文或由英、俄、日等外文译成汉文）占有较大比例。而且，其中的许多读物多年来一直成为本社的品牌图书和畅销品种，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新疆唐代歌舞艺术》、《伊犁民歌》（以上均为1980·维文）、《哈萨克民间图案集》、《新疆少数民族歌曲选》、《新疆兄弟民族民间故事选》、《新疆动物故事选》、《新疆简史》（一、二）（以上均为1980·汉文）、《哈汉词典》（1980·哈文）、《江格尔传》（1980·蒙文）、《维吾尔民间长诗选》、《维吾尔古典文学选编》、《维吾尔寓言选》、《新疆历史文物》、《突厥语大辞典》（以上为1981·维文）、《真理的入门》、《历代西域诗钞》、《艾力甫与赛乃姆》、《天山歌曲选》、《西域文化史》、《中亚简史》、《辛亥革命在新疆》（以上为1981·汉文）、《阿拜之路》（1981·哈文）、《蒙古传统民间歌词集》（1981·蒙文）、《汉维词典》、《论维吾尔古典文学》、《维吾尔民间文学基础》、《叶浅予舞蹈画册》（以上为1982·维文）、《古代维吾尔诗歌选》、《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以上为1982·汉文）、《来自辉番卡伦的信》、《徙迁之歌》、《锡伯族迁徙考记》（以上为1982·锡伯文）、《维吾尔成语词典》、《格则里》、《新疆维吾尔民间花帽图案集》、《维吾尔民间童话》（以上为1983·维文）、《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民间歌曲选》（分民族·多卷）、《乌孙研究》、《塔吉克族简史》、《新疆考古三十年》、《左宗棠与新疆》、《新疆历史人物》（以上为1983·汉文）、《三国之歌》（1983·锡伯文）、《伊犁游记》、《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作品选编》、《十八——十九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下）、《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以上为1984·汉文）、《新疆作家作品论》、《论维吾尔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丝绸之路造型艺术》、《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伊斯兰教建筑》、《柯尔克孜民间图案集》、《西域史论丛》（一、二）、新疆各民族“五套丛书”、《北庭史地研究》、《新疆简史》（一二三）、《新疆宝石和玉石》、《新疆风物志》（以上为1985·汉文）、《贯云石作品辑注》、《维吾尔族乐器》、《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西回鹘国史的研究》、《西蒙古史研究》、《喀喇汗王朝史稿》（以上为1986·汉文）、《古兰经的故事》、《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神秘的古城楼兰》（以上为1987·汉文）、《汉哈辞典》（1987·哈文）、《英雄史诗》、《卫拉特历史文献》、《蒙古秘史》（以上为1987·蒙文）、《锡伯（满）语词典》、《旧清语辞典》、《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以上为1987·锡伯文）、《新疆民俗》、《锡伯族历史与文化》、《吐鲁番的古代文明》、《天山游记》（以上为1989·汉文）、《哈萨克语详解辞典》（多卷·1989·哈文）、《锡伯族习俗志》、《格吐肯书法集》（以上为1989·锡伯文）、《玛纳斯》（多卷·1989·柯文）、《新疆古生界》、《锡伯族研究》、《新疆汉语方言词典》、《新疆的宝藏》、《新疆黑汗朝

钱币》(以上为1980·汉文)、《萨满歌》(1990·锡伯文)、《佛国于阗》、《克孜尔石窟佛本生故事壁画》、《五民族谚语》(以上为1991·汉文)、《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新疆曲子戏选》(以上为1992·汉文)、《维吾尔风俗志》(1993·维文)、《新疆通志》(多卷)、《哈密文物志》、《锡伯族史》、《新疆历史词典》、各州市县组织史资料(以上为1993·汉文)、《伊斯兰教词典》(1994·维文)、《新疆民族史研究》、《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和田玉》(以上为1994·汉文)、《锡伯营职官年表》(1994·锡伯文)等。

1995年以后,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新疆人民出版社文化积累性图书的出版越来越困难,出现逐年滑坡的现象。但在这一时期,有关西域文化方面的作者群已相当成熟,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的一批作者,已成为西域文化出版方面的重要力量。虽然1995年之后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域文化方面著述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然而之后推出的著述质量则比以往大有提高,基本都成为品牌读物。例如:《丝绸之路研究丛书》(1-10)、《西域探险考察大系》(1-10)、《亚洲探险之旅丛书》(1-10)、《探险与发现丛书》(1-10)、《新疆民族辞典》、《西北民族词典》、《新满汉大词典》、《西域地名词典》、《锡伯族百科全书》、《中国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新疆边防概要》、《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上下)、《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哈萨克族历史与民俗》、《哈萨克族文化大观》、《走向21世纪的新疆》(1-3)、《20世纪新疆史研究》、《中共新疆地方史》、《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西域图志校注》、《中国新疆古代陶器图案纹饰艺术》、《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1-3)、《民国新疆史》、《新疆对苏(俄)贸易史》、《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史料》、《中国新疆》、《中国新疆山普拉》、《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新疆古代雕塑辑佚》、《库车库木吐拉石窟》、《托克玛克之恋》、《新疆屯垦》等(以上均为汉文)。1995年之后,有关西域文化方面的少数民族文字著述受冲击更大,图书品种减少更多,甚至有的文种竟无一个品种推出。而汉文由于筹资渠道渐宽,基本保持了一年几个至十余个品种的出版。这对一个综合型人民出版社来讲,不能不说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

西域文化,本质上是具有地区特色的民族文化的综合,其中既有氏族部落文化的成分,又有部族文化的痕迹;既有北方游猎、游牧和绿洲农业经济文化的特色,也遗留有东西文化交流和结合的痕迹;既有氏族社会文化的余迹,还更多地保留着封建社会(包括农奴制)的文化成分;既有北方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又有中原汉族文化融入的表现。它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之所以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有着中华大地各地区、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结合为一个整体,组成了一个博大的文化大家庭。因此,无论何地区、何民族的文化,均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因子,弘扬地区或民族文化(主要指优秀传统文化),实则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如果中华文化缺少地区或少数民族文化因子,就无法体现其丰富多彩的多民族特色。

文化既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特定意义而论，它又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即任何地区性和民族性文化，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会不断地更新、变化（或称变异），甚至消失。因为文化是在历史上产生、形成和积淀的人文现象，是历史的附属物、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先进性和文明性不会超越所处社会的文明程度，绝大部分文化现象，经过一定的历史时期，一般都会表现出其历史的局限性和滞后性，这就决定了文化的历史性特点，阐释了特定的文化现象与其特定历史的不可分割性。历史创造文化，文化可以反映历史；文化既在历史上形成、积淀，又会在历史上变异或消失。所以，作为出版部门，积极参与对文化的整理和出版，既是对历史上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又是一种对历史的再现及其对文化的抢救，其意义不可小视。

50多年来，新疆人民出版社始终参与对西域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整理出版，使该社成为西域文化整理、出版的中心，尤其是近20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国内外了解历史上的西域、认识现在的新疆，做出了贡献。总结新疆人民出版社50余年来的出版实践，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提及。第一，出版社的使命似乎一直被认为是“为他人作嫁”，起着制作图书这一商品外在特征的作用。其实并非尽然。一个对本地区及其民族文化重视和负责任的出版社，对一部文化书稿，它应该参与其全过程，即资料的搜集和运用、书稿提纲的拟定、写作过程及定稿等程序，出版社均应施加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些重大文化项目，出版社更应该高瞻远瞩，自己拟定课题、选作者、制订操作规划，使作品达到一流水准，以使充分反映本出版社的综合水平。否则，出版社在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中，始终处在“尾巴主义”的处境，仅仅起一种“来料加工”的作用，也就生产不出真正的传世“商品”。

第二，一个综合型出版社，尤其是人民出版社，在其出版活动中，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不可与其他专业出版社相比，它所处的地位可谓高人一筹，国家对它们的要求也是另有规范。所以，出版社主要领导（如社长、书记、总编辑）综合素质的高低，对出版社业务工作的好坏起决定性作用。何时、何阶段的主要领导综合素质表现不凡，那么何时、何阶段所推出的文化读物便被社会所广泛接受，成为传世品。否则就会成绩平平，甚至无所作为。

第三，一个出版社能够盛誉在外，为广大读者和作者所信任，并非因为其招牌如何、其级别多高，而是因其文化读物为众所接受、所喜欢，也是因为该出版社编辑队伍素质较高，作者的作品质量得到保证的缘故。另外一方面，出版社多年来积累的品牌读物和优良的出版文化，也是一个出版社盛誉在外，深深吸引广大读者和作者群的重要原因。因此，出版社要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刻意创造自己的品牌群，并保证其连续性和不断升华，还要始终保持编辑队伍较高的整体素质。因为，出版社创立自己的品牌群，关键在于编辑队伍，编辑队伍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图书各方面质量的好坏。尤其是多民族地区出版社的编辑，客观上对他们的素质要求更为严格，他们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学识范围更广泛、更杂，对本地区及其民族文化应有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并具有浓厚的文化观，这样，他们才能对一切文化现象独具慧眼，生产出广受欢迎的文化产品。